

《百年明史論著目錄》評介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1752 頁。

張繼瑩^{*}

一

目錄之學起於劉向、劉歆父子編著《七略》，後《漢書·藝文志》承繼此風而成篇。今日秦漢典籍雖有所佚失，但歷代學者仍能領略古代學人的思維、著述論說的型態以及百家爭鳴的盛景，此實為目錄之功。目錄的整理與編纂在當今學術上更為重要，完成學術論文要靠書目的累積，檢視他人論文的可信度往往也從書目入手。無論古今，學問之始，必由目錄奠基。

臺灣明史學界早有編纂書目的風氣。民國五十二年，包遵彭主編的國防研究院點校本《明史》，書後附有〈明史研究論文目錄〉，是早期臺灣研究明史的參考書目。¹然而，缺漏甚多，²目前已經少有人使用。民國五十五年臺灣大學歷史系夏德儀教授曾組織編輯《明史論文提要》一稿，³收錄 179 篇文章摘要，其中收錄許多作品，是來自當時留在大陸的明史專家所撰。對峙的政治氣氛下，這些著作甚難見到，流通與保存都有朝不保夕之憂。此稿在今日看來，實有保存文獻的深意。業師徐泓教授當時受業於夏德儀教授，與其役而畢其功，並於民國六十年撰文〈民國六十年間的明史研究〉，⁴欲一窺民國三十八年以前

* 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¹ 國防研究院明史編纂委員會點校，《明史》（臺北：國防研究院，1963）。

²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46。

³ 《明史論文提要》完稿後一直沒有出版，直到 2010 年才由東吳大學資助出版。見夏德儀主編，《明史論文提要》（臺北：東吳大學，2010）。

⁴ 徐泓，〈六十年來明史研究〉，原收於《六十年之國學（三）》（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 379-452。

中國的明史研究及民國三十八年至六十年之間的臺灣明史研究，實賴此文。此文擴充後，今收入徐泓教授著《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以下簡稱《徐編二十研究》）。⁵

民國六十八年起，吳智和教授發表〈明史研究中文報刊論文專著分類索引〉（一）至（六）於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中國文化季刊》），⁶收錄自民國元年至六十七年底中文報刊上的明史論文專書，部分內容涉及大陸報刊與出版品，計收條目 5,543 條（以下簡稱《吳編目錄》）。此後吳智和教授自編《明史研究專刊》，亦以年為單位收入民國六十八年以後的明史論著。吳智和教授於民國九十三年，與賴福順教授編成《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第五冊·明清史》的研究書目（以下簡稱《吳賴合編戰後目錄》）。⁷雖然《吳賴合編戰後目錄》為新出目錄，但比起《吳編目錄》與《明史研究專刊》的書目，無論篇幅或數量都較前簡略，並沒有全面反映出臺灣近期的研究進展。

近年來，臺灣明史學界並無目錄工具書的編纂出版，但週期性明史論著目錄的整理卻未曾停歇。民國八十四年「中國明代學會」成立，即以年度為單位，針對臺灣明史領域中的學位論文以及研究新作進行目錄整理，並刊載於各期《明代研究通訊》（2004 年改刊名為《明代研究》），行之有年，已成傳統。現在，更著手收集大陸大學之明史學位論文目錄，期能掌握更全面的學術動態。

日本學界編纂明史論著目錄的肇始者為山根幸夫教授，他於 1960 年編纂《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以下簡稱《山根編目錄》），⁸收入 1900-1960 年間中、日文論著共 2,515 條資料；之後又編成《新編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專收日文、韓文明史文獻（以下簡稱《山根新編目錄》）。⁹這兩套目錄對於掌握日韓學界研

⁵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13-184。

⁶ 吳智和，〈明史研究中文報刊論文專著分類索引〉（一）、（二）、（三）、（四）、（五）、（六），*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中國文化季刊），20：2（1979），頁 129-165；20：3（1979），頁 92-144；20：4（1979），頁 81-143；21：1（1980），頁 93-150；21：2（1980），頁 115-144；21：3（1980），頁 121-140。

⁷ 吳智和、賴福順，《戰後臺灣的歷史學研究：1945-2000·明清史》，第 5 冊（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⁸ 山根幸夫，《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東洋文庫，1960）。

⁹ 山根幸夫，《新編明代史研究文獻目錄》（東京：汲古書院，1993）。

究動向，是相當基礎的入門書籍。特別是《山根編目錄》編纂的年代，正處於世界冷戰時期，臺灣學界多少也能透過《山根編目錄》了解大陸學者的研究概況。

大陸明史學界於 1980 年代開啟兩岸三地研究目錄的編纂計畫，成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纂《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以下簡稱《八十目錄》），該書收錄兩岸三地 1900-1978 年間的中文論著，總計一萬餘條。此書一出可以說是當時最豐富的目錄工具書。¹⁰然當時的環境下，收錄臺灣學者的作品並不完整，但已經足以反映當代大陸學界明史研究的概況。2001 年時大陸學者南炳文亦對二十世紀的明史研究作一回顧，完成《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一書（以下簡稱《南編二十回顧》），該書特殊的價值不只是整理書目，更重要是評述大陸明史研究的階段與成果，他認為明史研究有三個階段：分別是 1949 以前的明史研究、1949 至文革結束的明史研究以及改革開放後的明史研究。¹¹《八十目錄》收錄的時代正好反映 1949 年以後的中國明史學界，經歷幾次政治運動後以及文革後調整的研究觀點。201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再推出《百年明史論著目錄》（以下簡稱《百年目錄》），收錄文章延續《八十目錄》，其意義在於展現改革開放後三十年來的明史研究。

以上簡介臺灣、日本與大陸編纂的明史目錄，由於這些目錄的編成直接或間接表現三地學術發展的脈絡，故評介《百年目錄》時，兼與臺灣、日本的目錄成果進行比較，不失為近半個世紀明史研究的側寫。¹²

¹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纂，《中國近八十年明史論著目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

¹¹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¹² 本文討論的目錄中有兩類不列入討論，一為以作者為提綱編排的《明史論文提要》，一為以年度編排書目的《明史研究專刊》、《明代研究》。

二

《百年目錄》分上、下兩冊，收錄 1900 年至 2005 年之間大陸、港、澳、臺等地正式發表的論著書目。主編許敏教授，任《中國史研究》編審，研究領域為明代商業與社會史，有多篇史料介紹與研究回顧發表。¹³《百年目錄》的編纂，緣起 2002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分立之際。明史研究室成立後即召開會議，向各界學者諮詢未來發展的建議。會上學者有鑑於《八十目錄》對研究的影響，認為應該在二十世紀結束時繼續把近二十多年的新成果編成目錄供大眾使用。這樣的契機下，明史研究室開始投入編纂此書。《百年目錄》比起《八十目錄》的資料量，增添近三萬條以上的資訊，編排的結構也有所調整，既有傳承亦有創新。

《百年目錄》中採取編目分類的方式來整理龐大的資訊。分類項目包括：總論、政治、軍事、法律、經濟、社會、民族、思想文化與教育、中外關係、宗教與信仰、科技、地理與環境、文學藝術、文獻與檔案文書、文物考古、人物、研究綜述與資料、書評、著作。每項目之下又分若干小主題，閱者可以很快依照自己關注的焦點找到相關的論著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從《八十目錄》到《百年目錄》的綱目分類有不少調整與改變，從中可以看到學風與治學方法的變化。舉例來說，「農民起義」是中共史學相當重要的熱點。¹⁴《八十目錄》中把「元末農民起義和明朝建立」列為同一項目收錄，似乎意指元末的動亂都與農民起義有關，明朝的建立也是農民起義的結果。這個觀點在《百年目錄》中則改列入「政治」大項目下的小主題之一，且不全是談論「元末農民起義」，而是廣泛收錄「農民戰爭與民變」的議題，兼及「元末群雄」。《百年目錄》中將元末各地勢力廣泛歸入「農民戰爭與民變」之中，不再統稱「元末農民起義」，詞彙也增加了「元末群雄」來指稱反元的勢力。這顯示，近期研究已經觸及到元末各地反元的勢力確實不單只有農民，由於組成多元，以「元末群雄」來概括或許更為符合歷史事實。

¹³ 許敏資料詳見：<http://ich.cass.cn/UserInfo.asp?UserID=93>，檢索日期：2013.11.10。

¹⁴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42。

對照日本學界的目錄，元末的各種動亂在《山根編目錄》中置於「一般史」與「階級對立」兩節之中，在《山根新編目錄》中則置於「一般史」與「反亂」當中。這個趨勢也與中國學界的轉變類似，不再將元末戰爭視為單一階級的活動，也不單純視反元為階級鬥爭的產物。雖然說元末群雄或者反亂的定義，仍不免有價值觀判斷的語意存在，但脫離意識形態，尋求歷史真相作為分類項目的改變相當值得肯定。

臺灣由於不受階級史觀的影響，因此處理元末動亂的議題時，也就相對多元而不受概念辭彙的限制。《徐編二十研究》特別討論「元末革命的性質」，認為民初以來反元革命早有民族革命說以及社會革命說兩派，社會革命說主要是反駁純以民族思想解釋「元末革命」發生的單一性。例如蒙思明、薩孟武以及錢穆的論文都指出「元末革命」的複雜，不能純粹以一種原因來概括元末動亂。¹⁵《吳編目錄》以傳統正史的編纂思維為綱，將反元勢力分以朱元璋反元事蹟與非朱元璋反元歷史來作分類。關於朱元璋反元的研究在《吳編目錄》收入「綜論」中的「帝王」主題。非朱元璋陣營的反元勢力則收入「社會」項下「諸階層」中。《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承襲《吳編目錄》的想法，以同樣的方式分類反元的動亂。此外，《吳賴合編戰後目錄》也注意到元末宗教力量對社會的影響，因此在「社會經濟」項下的「民變、教亂」之中收入元末白蓮教的研究。看起來《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擴充原編議題的項目，但增收的條目有限。

三

《八十目錄》中將「政治、軍事、法律」列為一大項，但在《百年目錄》中已經分成三大獨立項目。可見政治、軍事、法律的議題在近三十年都有長足發展。政治項目下，《百年目錄》的分類不再單以宦官、黨社等主題收錄，而將此類問題統合在「政治集團」的主題之下。這樣的改變基本上也與近期政治史研究中著重人際網絡與權力運作的新視野有關。在「政治集團」主題下收錄

¹⁵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 51-52。

了宦官（閹黨）、東林、復社、幾社與明遺民等議題。可見現今看待中國傳統政治，不只重視結黨的行為，更重視這些政治集團背後共同目標與利益基礎。對照《徐編二十研究》以「明季之黨爭與社盟」為題統合此類文章，雖然沒有明言「政治集團」，但「社盟」的觀念已指涉此一領域。只是「社盟」項下的文章指出，並非所有明末諸社都是專務於政治之上。這或許也是因為結社行為本身目標的多樣性，才選擇「社盟」這樣的辭彙加以表達。

若以「政治集團」定義來看，黨社是有形的組織，共同目標或利益結合是無形的力量，那麼這個項目幾乎可以廣義包含整個政治史的領域。例如：明初殺戮功臣、大禮議等政治的大事件似乎都可以歸類到這個項目之下。然而，若將大事件都歸入「政治集團」之下，為遷就「政治集團」的概念，反而淡化事件的特殊性。因此《百年目錄》也只能偏取其有形的部分來歸類文章。這或許是《山根編目錄》沒有政治集團規劃的考量；也可能是《吳編目錄》與《吳賴合編戰後目錄》以「結社、黨爭」及「明末黨爭結社及其變動」為收文條目的主因。

「軍事」方面，《徐編二十研究》主要是以邊防與戰爭事件來設立項目，《吳編目錄》分了「總論」與「戰史」，一部分軍事制度問題分在「政治」項下。《吳賴合編戰後目錄》則籠統以「軍事」納之。《八十目錄》則細分「通論」、「衛所」、「兵器」、「軍餉」、「其他」項目。其中「軍餉」的文章，《百年目錄》把軍餉放到更廣大的範圍中來思考，改成「後勤保障」的主題。雖然此項收錄的文章不多，但從內容來看，多少有從數字考實的研究變成探討實際運作層面的轉向。故而，在新立項目預見的未來是軍備、軍餉、糧草徵集與運輸等老問題都可能以新觀點進行討論。

社會經濟的問題方面，《八十目錄》中原將「社會經濟」列為同一項目。《百年目錄》則分為「社會」、「經濟」兩項。其中不乏歷史研究觀念改變的痕跡。例如《八十目錄》中特別立了一項「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但《百年目錄》則分散到「政治」項下的「農民戰爭與民變」以及社會項下的「社會分層與社會群體」之中。顯示近年研究除了階級對立的議題外，更重視是階級的形成與各階層的流動與互動。學術走向不再只是強調對立的矛盾，更有對共同生活步調的關注以及生活文化的重視。因此，《百年目錄》立有「社會生活」的新項

目。由於調整對立關係的認識，以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概念為中心的社會觀察也就得到修正。《百年目錄》之中首次出現「社會管理」的概念。由於以管理代替控制，於是「社會保障」類目就顯得特別有意思，似乎將一個社會所面臨的「風險」也列入管理的範圍之內，舉凡賑濟、荒政都收在此類目之中。臺灣《吳賴合編戰後目錄》應該也注意到類似的問題，所以在「社會經濟」項目下特立「社會事務」，同樣收入災荒與荒政的文章，這與「社會管理」的概念頗有相通之處。

《百年目錄》以「政治集團」、「社會管理」作為分類項目，可以說是特別醒目的地方。過去的目錄多是以人、事、物來進行分類，《百年目錄》則引入社會科學的概念來重新定義分類項目。然而，歷史是處理時間轉移時人、事、物變化的軌跡，《徐編二十研究》嘗試將條目結合時間軸線來處理分類，例如：「資本主義萌芽」的項目在《百年目錄》中是單獨存在的項目，但《徐編二十研究》則繫於「明代中、後期的經濟與社會」之下。兩種編法並無優劣之分，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設立靜態的概念項目，要如何表現時間變動的影響與結果，顯然是編纂者體例上的兩難問題。

四

分類方式不同顯示早期學者的研究焦點與現代焦點的差異。《南編二十回顧》中在改革開放時期以後的明史研究中特別新立一項「區域史方面」，可見以區域為研究對象的歷史著作已有相當成果。¹⁶因此《百年目錄》特別重視分區特色的類目設置，這是在《八十目錄》中所未見的。反映在《百年目錄》「經濟」項下，除了收錄土地、賦役、財政、人口、農工商等議題外，也列出「區域經濟」，內容收有江南、福建、廣東、湖廣、西南、東北、西北、臺灣研究的文章；「社會」項下也特別列出「區域社會」一項。《徐編二十研究》、《吳編目錄》、《吳賴合編戰後目錄》、《山根編目錄》、《山根新編目錄》收錄文章多集中 1980 年以前，區域研究的文章數也許不夠，因此沒有在目錄上顯現出來。

¹⁶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43-158。

類目的設置反映了近期學術的潮流。例如目前對環境史的重視，《南編二十回顧》已經指出「人類活動與自然相互關係方面」是近期的主流，¹⁷《百年目錄》則出現「地理與環境」一類。除了吸收《八十目錄》中「歷史地理」項目下的內容，更增添自然災害以及開發對環境的影響，相關環境議題也可在此類中找到；除《八十目錄》缺列宗教外，各目錄都有宗教項目。《百年目錄》更有佛教、道教及民間信仰的分類，並立伊斯蘭教、基督教的分類，可見編者已經意識到世界宗教在中國的多元發展與研究概況。當前學術強調「全球化」的議題，編者試圖在《百年目錄》「中外關係」的類目中，以明朝與世界各區的交流作為主軸來展現西方中心以外的「全球化」過程。議題也就從中日、中歐以及鄭和下西洋，轉向明朝與全球各地的交流。¹⁸

不過《百年目錄》要全面反映當前學術走向卻非易事，例如醫療史的發展是從社會史中逐漸發展出來，然而在《百年目錄》社會項下卻沒法列出醫療史的項目，反而醫療史的相關文章皆歸入科技項下「醫藥」的部分。這大概是編目設定時很難避免的問題，畢竟醫療史與科技史中的醫藥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非要同中求異也是強人所難。

目錄編纂的變化，不但可以看到一個研究議題逐漸擴展的過程，也可以體會到歷史研究者因本身的立場不同，對歷史的著眼點將產生不同的興趣與解釋方式。例如南明與鄭成功（1624-1662）的議題，《八十目錄》、《百年目錄》、《吳編目錄》、《吳賴合編戰後目錄》都把南明與鄭成功收錄在「政治」一類，《徐編二十研究》繫於「明朝衰亡與南明抗清之研究」之下。《山根編目錄》則把「鄭氏および南明」放在「日明關係」之下；《山根新編目錄》則不把南明放在「日明關係」之下，¹⁹但無論是《山根編目錄》或《山根新編目錄》都在外交

¹⁷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64-165。

¹⁸ 改革開放後，中外關係不再緊繃，所以改革開放後有大量作品出現。與 1949 年以前專注於中日、中歐關係上有所不同，此時對於明與世界各地的交流研究紛紛出現。見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1-13、15-19、185-201。

¹⁹ 鄭成功因其母親為日本人，因此在日本相當受到重視。日本殖民臺灣之時即大力塑造鄭成功與日本的關係，一直到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仍執著於鄭成功是日本人這個說法。此思潮是否影響到《山根編目錄》的分類仍有待觀察，因為在「鄭氏および南明」項目下收有鄭氏乞師日本的研究，不過為數甚少，也許是《山根新編目

與軍事分類上展現對「日、明關係」的關懷。

同樣的情況在民族問題上更為明顯。中國各地的民族複雜，中共建立政權後，強調民族平等，對中國境內民族進行識別的政策，並在學術上推動民族研究。因此民族研究本來就是兼具歷史與現實兩方面的考量。²⁰《八十目錄》中以各區各族編纂目錄；《百年目錄》編者則以區域的方式來統合民族的研究，民族項下分有民族政策、東北、北方、西北、西南以及中南與東南地區。比較日本學者的目錄，《山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中都放在「周邊史」項下。仔細閱讀《山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的內容可以發現，其中細項也有變化。《山根編目錄》中「周邊史」項下為「朝鮮·滿洲」、「蒙古」、「南方」、「西方」；《山根新編目錄》則是「朝鮮·琉球·臺灣」、「滿州」、「蒙古」、「南方」、「西域·西藏」。這個變化也相當有趣，一方面可以理解為從 1960 年到 1993 年研究方面的擴大與新論文的成果累積；另一面則從分類中看到日本的興趣議題仍與明治維新後中日關係的歷史遺產有關，²¹所謂的「周邊史」大概與現實政治環境都脫不了關係。由此，也可以聯想到《八十目錄》與《百年目錄》之中，「民族」項下，文章數量甚鉅之因，大概也是政治環境對「民族」議題的重視所致。

臺灣編纂的目錄中《吳編目錄》將民族類文章收於「邊陲關係」；《徐編二十研究》則強調明朝為中心與「周邊各民族」的關係。從現實來看，臺灣政治經驗沒有經歷大陸深刻的民族問題，也沒有經歷日本對亞洲的想像，反而更能以收錄文章的視角來設計分類項目。若從收文內容來看，《吳編目錄》與《徐編二十研究》所收之文多是民國三十八年以前的文章，當時流行的解釋觀點都是以中原為中心的詮釋角度。綜合這兩項因素，臺灣學者設計收文項目自然偏向以明王朝為中心的立目方向。

錄》調整的原因。日本對鄭成功崇拜的相關問題，參見高致華，《鄭成功信仰》（合肥：黃山書社，2006），頁 272-285。

²⁰ 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52。

²¹ 1949 年以前中國明史研究中很熱門的題目有滿清入關前的東北以及明代中日關係，這其實某方面也是對映日本侵華的背景而出現的研究脈絡。南炳文，《輝煌、曲折與啟示：二十世紀中國明史研究回顧》，頁 11-13。

五

分類立目要求周全並不容易。中日學界思想文化的文章數量相當龐大，《山根編目錄》與《山根新編目錄》都以王陽明（1472-1529）及「陽明學派」作為中心主軸來做為分類界線，兼及日本漢學的發展。臺灣《吳編目錄》處理思想研究的方式，則以《明儒學案》的編目法則來做為分類標準，這可能是早期學者研究學術思想時，多數是延續《明儒學案》進行研究的影響。²²《百年目錄》在「思想文化與教育」項下囊括了「通論」、「哲學」、「史學」、「教育」、「科舉」、「語言文字」、「藏書與刻書」、「其他」等項目。這承襲《八十目錄》的分法，僅增設「教育」、「科舉」兩項。以科舉來說，到底要放在制度、文化或者社會，確實都值得進一步思考。再說「哲學」一項，明代後期王學雖然相當盛行，但從宋到明的變化，以及非王學的學術思想該如何歸類到一個大類，則有賴於設計更細緻的主題類目。但《百年目錄》刪除《八十目錄》以思想家與其群體設計的主題類目，也因此讀者在檢閱《百年目錄》時，會感覺整個明代的思想籠統地放在「哲學」之內，分類的意義也就相對減弱。

《百年目錄》收錄大量臺灣學者的研究。早期胡適研究《水滸傳》以及民國四十九年時為〈皇明監國魯王墳誌〉作跋的文字，皆收錄在目錄之中。²³再檢視《百年目錄》索引所列的臺灣學者，幾乎涵蓋臺灣研究明史的先進與後輩，可見其對臺灣研究者的掌握是相當詳細的。唯仔細檢閱後，仍發現收錄文章不全的問題。大型目錄缺漏在所難免，但有些文章失收實在相當可惜。例如：徐泓教授曾對明史書籍有諸多點評之作，但民國七十二年一篇評論孟森著新校點本《明史講義》的書評即不見蹤跡。²⁴該文指出《明史講義》新校點本的疏漏與改寫之失，應是學者研究版本相當重要的參考文獻，失收於目錄，是讀者一大損失。又如何淑宜教授條目下僅收一篇〈岸本美緒教授「明清社會與身分感

²² 臺灣在社會文化史興盛之前，思想史研究無論在質與量都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中文、哲學等學科也經常討論明代學人、學術，現有的臺灣目錄似乎都還沒有反應這個趨勢。

²³ 胡適的文字在《吳編目錄》與《吳賴合編戰後目錄》皆無收錄。

²⁴ 徐泓，〈評孟森著新校點本《明史講義》〉，《漢學研究》，1：2（1983），頁701-705。

覺」演講側記〉，²⁵卻沒有收錄何譯岸本美緒專書序言的內容。²⁶讀者若能兩文對看，更有機會理解「明清社會與身分感覺」這個主題，少了譯文難免覺得有些未盡之感。²⁷

書目工具書的價值不僅在收錄全否，更重要是某些分類將有助於後學者擴展學術的眼光。《百年目錄》中最少有五個方面展現此遠見：

(一) 收入國外研究作品的譯文條目。此大有助於學者接觸國外學者的研究。以臺灣學界相當熟悉的濱島敦俊教授為例，²⁸閱讀濱島教授的文章單從日文入手，初學者頗感困難。筆者記憶所及，〈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的中文譯本，²⁹相信是許多人認識濱島教授作品的敲門磚。所以，《百年目錄》特別收錄翻譯文獻一類，對學術基礎的入門指引有相當的貢獻。唯獨可惜的是，《百年目錄》中對於 2005 年以前濱島教授著作的中文譯本，只收錄了一半而已，缺漏之文包括：〈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業食佃力考〉、³⁰〈「主佃之分」小考〉、³¹〈舊中國江南三角洲農村的聚落與社區〉、³²〈近世江南金總管考〉、³³〈近

²⁵ 何淑宜，〈岸本美緒教授「明清時期的身分感覺」演講側記〉，《明代研究通訊》，6（2003），頁 115-120。

²⁶ 岸本美緒著、何淑宜譯，〈明清地域社會論的反思——「明清交替と江南社會」新書序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0（2000），頁 164-176。

²⁷ 何淑宜教授著作目錄見：
http://120.126.128.237/joomla/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03&Itemid=262，檢索日期：2013.11.10。

²⁸ 濱島敦俊教授著作目錄見：
http://www.his.ncn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13&Itemid=336，檢索日期：2013.11.10。

²⁹ 濱島敦俊〈均田均役の實施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33:3(1974)，頁 393-423。中譯：樂成顯譯，〈圍繞均田均役的實施〉，收入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6 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92-228。

³⁰ 濱島敦俊，〈業食佃力考〉，《東洋史研究》，39:1（1980），頁 118-155。中譯：陳柯云譯，〈業食佃力考〉，收入李範文，陳奇猷主編，《國外中國學研究譯叢》，2（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123-163。

³¹ 濱島敦俊，〈「主佃之分」小考〉，收入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東洋史論叢：中村治兵衛先生古稀記念》（東京：刀水書房，1986），頁 392-412。中譯：收入趙毅、林鳳萍主編，《第七屆明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1999），頁 1-8。

³² 濱島敦俊，〈明清時代、江南農村の「社」と土地廟〉，收入明代史研究會明代史論叢編集委員會編，《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東京：汲古書院，1990），

世江南李王考》、³⁴〈農村社會：研究筆記〉³⁵以及中文論著〈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朱文肅公集》和朱國禎〉、³⁶〈江南三角洲的聚落和共同體：「村界」、「產權」問題商榷〉等文。³⁷

(二) 重視「文獻與檔案文書」、「文物考古」的編目。「文獻與檔案文書」中收錄甚多文獻資料的評述，其中關於地方志、地方文獻以及公私藏尺牘的介紹與研究，許多都是藏於大陸圖書館的善本，這些都有助於臺灣學者開拓資料以及研究的視角。「文物」的編目收入明代的考古報告與相關研究，這是臺灣學者較少注意的層面。眾所周知，文物能與文字互證歷史，但由於過去取得考古資訊不易，甚少見到學者專門討論文物與文字的關係，這個項目的介紹或許將來能使臺灣學界討論明史議題時有更多互相發明的可能。

(三) 收錄報紙上所登的明史專文。報刊明史專文向來甚少為臺灣學者引用。隨機檢閱下發現有不少名家都曾在報紙上發表明史的專論。這部分的資料，除了讓今日學者見到專業史學家面對大眾時書寫的特色外，也可以看到史學家受到政治影響，創作「古為今用」的時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研究明末歷史必讀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這篇文章原先發表在《新華日報》。當時為民國三十三年歲次甲申，郭沫若意有所指，把國民政府比做崇禎朝，而毛澤

頁 1325-1357。中譯：〈舊中國江南三角洲農村的聚落與社區〉，《歷史地理》，10 (1992)，頁 91-101。

³³ 濱島敦俊，〈近世江南李王考〉，收入梅原郁編，《中國近世の法制と社會》(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 511-542。中譯：〈近世江南海神李王考〉，收入張炎憲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6 輯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7)，頁 217-248。

³⁴ 濱島敦俊，〈近世江南金總管考〉，收入小野和子編，《明末清初の社會と文化》(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6)，頁 375-413。中譯：〈近世江南金總管考〉，收入鄭振滿、陳春聲主編，《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頁 183-221。

³⁵ 濱島敦俊，〈農村社會：覺書〉，收入森正夫等編，《中國史學の基本問題 4・明清時代の基本問題》(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155-180。中譯：沈中琦譯，〈農村社會：研究筆記〉，收入復旦大學歷史系、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鄉村社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55-279。

³⁶ 濱島敦俊，〈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朱文肅公集》和朱國禎〉，收入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頁 13-27。

³⁷ 濱島敦俊，〈江南三角洲的聚落和共同體：「村界」、「產權」問題商榷〉，《東吳歷史學報》，14 (2005)，頁 107-139。

東的紅軍則類比為李自成的部隊。透過檢討李自成的歷史來鼓舞中共士氣，創造必能打敗國民政府的氣氛，並借鑑李自成失敗之因，以免中共重蹈覆轍。這篇文章在中共內部一直是相當重要的文獻，是中共黨人史學古為今用的代表作之一。³⁸自郭沫若後，討論李自成、張獻忠的文字多見於報章之上。³⁹1949年之後，更是屢見報刊上出現明末動亂、李自成與張獻忠魂歸何處的報導（頁85-101）。這些不只是明史的重要資料，更是當代史的見證。⁴⁰這些都會是將來討論當代明史研究時，史學史上不可缺少的材料。

（四）收錄「書評」與「研究綜述與資訊」之文。將此類列為目錄收編標準是相當有遠見的。書評是可以快速理解重要著作的途徑；而現代學術會議上經常有許多精彩的文章與爭鋒的討論，但不見得會出版，而討論的交鋒更少在研討會後的論文集集中出現。唯有紀實能讓讀者理解到當時學術討論的焦點，這對後學者在研究角度的開拓，方法上的提升都是非常有幫助的文類。

（五）各類中增列「其他」項目。「其他」項目原為編者難以歸類時的權宜之計，然而細讀這些「畸零」的文章卻也相當有啟發，例如軍事項下的其他類中，南炳文、湯綱所著〈明代軍屯士卒的地位〉、盧仲維著〈明代奮勇禦外寇的廣西士兵〉、范植清著〈永保士兵在明代歷史上的活動軌跡〉、黃翥平〈棚兵抗清略述〉（頁157-158），幾篇文章似乎都在說明軍事制度下無名士卒的狀況，這也許是社會史可以繼續關注的議題。另外在經濟項下的其他主題，收錄了關於消費以及旅遊的文字（頁301），似乎也顯示收錄項目設定仍有擴大的空間。明代消費以及旅遊的研究在臺灣已經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或許在將來的目錄中可以見到議題的更新。

³⁸ 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135。

³⁹ 郭沫若文出版之後，國民黨即在《中央日報》發表〈糾正一種思想〉來抨擊郭文。1949年以前李文治、殷海光都曾在《中央日報》上討論李自成、張獻忠的問題。詳見徐泓，《二十世紀中國的明史研究》，頁141。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編纂，《百年明史論著目錄》，頁85。

⁴⁰ 目前已有學者從毛澤東對明史的運用與吸收來解釋明史於當代中國政治上的重要性。見翟志成，〈毛澤東對明代歷史文化的吸取和應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76（2012），頁1-40。

六

一部大型工具書最重要的就是方便閱者查找，本書以製作作者索引，正與目錄以主題作為分類，相互為用。只是索引仍有美中不足之處：《八十目錄》採取筆畫檢索，但《百年目錄》卻採取拼音檢索。漢字不論繁簡都以象形為基礎，以筆畫檢索似乎比較便利。世界對漢字的拼音本來存在不同的系統，而《百年目錄》並未交代採行的拼音系統，實造成不同地區使用者的困擾。在編目上，《八十目錄》中在大項目下繫有小主題，再按照文章出版年分依序排列。《百年目錄》雖依照這個邏輯編纂，但在《百年目錄》中小主題卻不見於編目中。在文章量大增之下，讀者檢索《百年目錄》時卻少了《八十目錄》中一目了然的便捷。

此外，同作者不同名的處理，並未統一條目，反而分立在不同項目，例如岸本美緒與中山美緒實為同一人，卻有兩個條目存在。書目中也有錯植的情況。臺灣明史大老張哲郎教授即誤植為「張哲誠」（頁 1726）。而簡體與繁體互換時也造成一些錯誤，已故的鄭樑生教授轉成簡體時變成「鄭梁生」，這些都是造成使用者誤解的地方。目錄收文中也偶見誤收與明代無關的文章。例如王孝廉著〈血櫻——關於霧社事件（上）〉、〈以血寫在山崗的名字——關於霧社事件（下）〉（頁 70）。不過這麼大量的資訊，要全然無誤也是苛求，但將所見一二小疵著錄訂正。

目錄的編纂不僅是論文條目的累積，更重要的是從各目錄分類的過程理解到學術演進的變化，以及史學家不停透過新觀點審思過去研究的價值與地位，同時也顯示出各地學者投注明史研究的心力與時代精神的關懷。由此觀之，《百年目錄》無疑是一部既能鑑古也能知今的工具書，更讓人期待的是編者於書後所言：「原意將國外學者的著作同時收入，但未盡全功。」更待來日，能有機會見到更新一版的明史論著目錄以及國外明史研究目錄的出版。